

劉勰文學大系(甲 98 圖冊) 第二卷



- 一、就整體的篇章結構而言，本文的撰寫並非止於對劉勰生平事蹟的敘述，而更著眼於劉勰文學思想的視野，從中國傳統文論的流變方式，令人對劉勰文學大系大啟。
- 二、本文的論述文字甚而清晰明白之外，又兼有穩健的論述策略，使全文的書寫展現出成熟的學術訓練。

門出，門出與學及以相李的專研千餘並，籍籍好與曾育兩樹朝。
 嚴的世長國階南晉東始，經出辭人心中中外部以呈章文編整
 誰人國權好乙含融並中其自顯出究而。服問會其的趙世初當於晉戲
 立出於其肯然固胡遊學文的歸隱，劉實及精野的理受與會其至八代
 爾爾登會其第代深辭人小圖一乙知兒。馬重朝當見未出略景區，靈
 平不與宗族的前

一、就整體的篇章結構而言，本文的撰寫並非止於對劉勰生平事蹟的敘述，而更著眼於劉勰文學思想的視野，從中國傳統文論的流變方式，令人對劉勰文學大系大啟。

沒落士族劉勰身世探微

摘要

本文以劉勰個人身世為主軸，探討東莞劉勰作為軍功集團後代的仕宦情形。東莞劉氏在劉宋時期因軍功興起，劉勰伯祖劉穆之曾經位高權重於當時，然而家族勢力隨後逐漸沒落；劉勰仕宦僅止於低階品級。蕭梁時代各種文學集團林立，士族文風頗盛，然而因為高門大族講究地望、籍貫，出身低階士族的劉勰未能一展長才，劉勰在蕭梁一代僅見用於參與佛經的編纂，而其著作《文心雕龍》亦並未受當時重視。梁武帝擢用寒門乃至一般士族掌握實際政治權力，而劉勰因為專精文學而非行政，始終未能任職要官。本文從劉勰的個人身世著眼，反映南朝之沒落士族空負個人能力卻無從發揮，無奈於現實環境的現象。

關鍵詞：劉勰 東莞劉氏 南朝士族 文學集團 佛經編纂

《文心雕龍》：(台北：華夏書局，1988)，411。
 《文心雕龍》：(台北：華夏書局，1988)，411。
 《文心雕龍》：(台北：華夏書局，1988)，411。
 《文心雕龍》：(台北：華夏書局，1988)，411。

前言：「奉時而騁績」的劉勰

《文心雕龍》作者劉勰為東莞莒縣人，歷經劉宋末、蕭齊、蕭梁三代。劉勰家貧早孤，二十歲失怙，¹守喪三年後入上定林寺投靠沙門僧祐，協助僧祐整理佛經，並研讀經典，居於上定林寺十多年期間寫作的《文心雕龍》，則多反映積極入仕的心態。《文心雕龍·程器》：

是以君子藏器，待時而動。發揮事業，固宜蓄素以弼中，散采以彪外。榘栝其質，預章其幹。摘文必在緯軍國，負重必在任棟梁。窮則讀善以垂文，達則奉時以騁績，若此文人，應梓才之士矣！²

劉勰在〈序志〉篇中記載受孔子召喚的夢境，藉此表示自己受聖人所託，寫作《文心雕龍》以儒家之道為本，將聖人言論反映於作品中。劉勰本於儒家思想，希冀能夠「奉時而騁績」；且上定林寺位於南京紫金山，高僧雲集，各王侯經常往返，在南朝四百八十個寺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。劉勰入寺「依沙門僧祐」，頗有「終南捷徑」的意味。³

¹ 本文關於劉勰生平的年代採用近人牟世金先生的考定。牟世金，《劉勰年譜匯考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88）。

² 劉勰，《文心雕龍輯注》卷10〈程器〉（台北：中華書局，1986，四部備要集部，中華書局據原刻本校刊），16。

³ 易健賢，〈劉勰三夢和他的「奉時以騁績」心態——關於《文心雕龍》成書的思考〉，《貴州教育學院院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1（貴州，1996），6。

《文心雕龍》書成。「勰自重其文，欲取定於沈約，約時貴盛，無由自達，乃負其書候約出，干之於車前，狀若貨鬻者。」⁴劉勰千方百計想認識吏部尚書沈約，以攔車的方式等候。終於受沈約推薦，起家奉朝請，進入仕途。劉勰24歲入定林寺，37歲得沈約推薦，起家奉朝請；遂與當時文士交流。「昭明太子好文學，深愛切之」⁵，梁天監19年昭明太子及其門下「昭明十學士」等編纂《昭明文選》，《昭明文選》的選文多為劉勰《文心雕龍》曾評論的文章。然而劉勰既為昭明太子「深愛」，時為東宮舍人的他為何在55歲，上書自請出家？南朝官僚致仕制度多以七十懸車作為告老還鄉的年齡⁶，70歲致仕在齊朝曾一度制度化。劉勰的才能若為皇室所用，為何在蕭梁年間編纂的文選《華林遍略》、《通史》、《歷代賦》、《古詩文苑英華》，均無劉勰出力的痕跡？劉勰《文心雕龍》是在上定林寺定居時所做，書中鮮有佛語，⁷在《文心雕龍·序志》也表露出劉勰積極入仕的決心。以儒家思想為本的他卻為何在步入仕途以後，僅只是參與佛經的編纂？劉勰撰文的長才可在《文心雕龍》略窺究竟，蕭梁皇室為何捨劉勰之長，一再命令劉勰參與編纂佛經？劉勰僅為「參與」編纂佛經，而非主導其事，是否表示劉勰實際並未受重用？

本文從劉勰及其文「未被時流所稱」⁸的現象探討著眼，首先以劉勰的家世出發，祖父劉靈真及伯祖劉秀之、父親劉尚以及劉勰本人的官品在蕭梁時代的等級象徵，說明曾以軍功起家的東莞劉氏沒落情形。第二部分探

⁴ 姚思廉，《梁書》卷50〈劉勰傳〉（台北：台灣商務，1988），411。

⁵ 姚思廉，《梁書》卷50〈劉勰傳〉，411。

⁶ 蕭子顯，《南齊書》卷6〈明帝紀〉「永明7年」條載御史中丞沈淵表奏：「百官年登七十者，皆令致仕。」

⁷ 《文心雕龍》一書中，佛語僅見的〈論說篇〉的「般若」、「圓通」。

⁸ 姚思廉，《梁書》卷50〈劉勰傳〉，411。

討齊梁時代的文學集團，文士交流仍多限於士家大族，如竟陵八友、昭明十學士；劉勰的未獲重視，是否也反映了南朝閥閱之別？梁武帝雖擢用一般世族乃至寒人，但多著眼於官僚行政上的能力，長於文學、佛理的劉勰是否因此官位始終是低階的清職？最後稍加介紹蕭梁時期佛經的編纂情形，見諸史籍記載的是劉勰撰寫僧人的傳記、劉勰跟隨僧祐整理佛經、以及受梁武帝之命參與編纂佛經的事跡。文末將本文所探討的大事與劉勰個人的經驗作對照。希冀從東莞劉氏與當時文學世家的關係、劉勰個人能力以及南朝官員選拔之背景，管窺在南朝蕭梁一代，沒落士族劉勰在當時政治、文化結構中的可能意義。

一、東莞劉氏的家世探討

根據王伊同先生《五朝門第》考察東莞劉氏家第如表：



資料來源：王伊同《五朝門第》（下）（十一）東莞莒人劉氏
（香港 新界 沙田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78）筆者在此僅作部分選取

（一）官位與品級

東莞劉氏為南朝南下之僑姓世族。劉穆之為劉宋時期開國元老，因軍功拔擢為前軍將軍、南康郡公、司徒，食邑三千戶，⁹權重一時。劉秀之在南朝宋時官至司空，為一品官。¹⁰劉穆之、劉秀之均被追贈三公，食邑千戶以上，為當時顯赫世族。蕭齊時期，劉勰之父親劉尙曾任越騎校尉（4品）。劉勰本人最高官至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。梁武帝天監7年改革官品，將九品品秩改為文官18班、武官24班。劉勰起家奉朝請（2班），後兼中軍臨川王宏記室（6班），轉車騎倉曹參軍（3班）、太末令、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（兼職為1班），若換算成九品官人法的品級，皆約莫7品官上下。¹¹劉勰歷任之官職皆大抵尚在清官之列，位清且實權亦不重，但與一般高門士族比較，存在著明顯差異。劉勰叔祖劉秀之任司空（1品），而劉勰最高任職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（東宮通事舍人之兼職相當7品），東莞劉氏一族官僚生涯顯然是逐漸沒落中。

奉朝請為一種加官虛銜，《宋書·百官志下》：「奉朝請，無員，亦不為官。漢東京罷省，三公外戚、宗室諸侯多奉朝請。奉朝請者，奉朝會請召而已。」¹²南齊永明中，任「奉朝請」之名者有六百餘人。¹³劉勰37歲起家奉朝請，高門士族吳興沈約亦起家奉朝請，然而沈約是在21歲即入

⁹ 沈約，《宋書》（下）卷42〈劉秀之傳〉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百納本二十四史，1988），752。

¹⁰ 沈約，《宋書》（下）卷81〈劉穆之傳〉，1186。

¹¹ 本文官品的換算，參照閻步克先生的說法。見閻步克，《品位與職位——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2），357-359。

¹² 沈約，《宋書》（上）卷40〈百官志下〉，719。

¹³ 蕭子顯，《南齊書》卷16〈百官志〉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百納本二十四史，1988），177。

仕。同為奉朝請之起家官，吳興沈氏年 20 初即入仕，入仕年歲之差別亦表示了地位之分。¹⁴

魏晉南朝軍府下管轄的官員品級依軍府府主本身的品級而定，官府屬吏的品級是受長官之品級所制約決定。劉勰任職中軍臨川王蕭宏之記室、車騎將軍夏侯詳之倉曹參軍、仁威南康王蕭績的記室，地位品級亦受長官蕭宏、夏侯詳、蕭績影響。以梁天監以後的武官 24 班視之，班數越多，其官愈重要。中軍將軍蕭宏為 23 班（3 品）、車騎將軍夏侯詳為 24 班（2 品）、仁威將軍南康王蕭績為 16 班。劉勰之長官班數既為節節下滑，是否意味著劉勰本人地位亦漸漸剝蝕？

東莞劉氏雖然在晉宋之際曾因軍功顯貴，官至一品司空，傳至劉勰卻沒落至「家貧，不婚娶」¹⁵。《南史·劉祥傳》記載劉祥被高門司徒褚彥稱呼為「寒士」，「寒士」雖非等同於「寒人」，¹⁶劉祥既然為劉穆之的曾孫，卻被如此稱呼。可見東莞劉氏一家之沒落。

（二）軍功之家東莞劉氏

根據毛漢光先生《中國中古社會史論》區別士庶之標準，三代之中有二代居官五品以上者為士族；稍有門資聲望，父、祖曾任官，並未達士族標準者，視為「小姓」；其餘為寒素。¹⁷汪征魯先生《魏晉南北朝選官體

¹⁴ 姚思廉，《梁書》卷 1〈武帝紀上〉「甲族以二十登仕，後門以過立試吏」。世家大族在 20 歲即可以入仕，一般士族或是寒門得年過 30 才能入仕。

¹⁵ 姚思廉，《梁書》卷 50〈劉勰傳〉，410。

¹⁶ 唐長孺，〈讀史釋詞〉，收錄於《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》，254-262。唐長孺先生特舉史書記載「寒士」數例，說明「寒士」仍屬於士人階層，絕非寒人。

¹⁷ 毛漢光，《中國中古社會史論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97），140-144。

制研究》強調士庶之分應參考文化（經學）、地域、時空等因素。¹⁸士族與寒門之劃分為相對而言，因為家門時有升降，寒門藉由任官步入低等士族尚稱可能，但要躍入高門大族則絕對困難。在士庶區分嚴格的東晉南朝，東莞劉氏雖非高門大族，卻也不是寒門庶族；東莞劉氏勉強可列入次級士族。但劉氏又與一般士族不同。劉勰叔祖劉秀之以軍功起家，軍功之家在南朝表示的意義可以作為觀察劉勰身世的一個重要角度。

宋文帝劉裕代晉，以百餘人的力量崛起於京口，率領寒微兵家北伐；於是一群社會位望不高的家族因軍功興起，東莞劉穆之跟隨劉裕，立下汗馬功勞，劉宋建立以後，劉穆之任左僕役、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尹，內總朝政，外供軍旅，權傾一時。¹⁹這些軍功士家的政治生涯與軍事結構的變遷也有著密切關係。南朝宋、齊王權的建立，以長江下游的京口軍團為主；梁朝時期，則是以長江中游的荊襄軍團為中心。²⁰南齊蕭道成代宋，自然疏遠原本憑藉京口軍團發跡的劉氏，而東莞劉氏由於失去軍權的掌握，勢力受到影響。另一方面，由於南齊前期軍事戰爭相對減少，軍功之家若非往文化發展，即會面臨沒落一途。²¹劉勰個人在梁朝，代表藉以武轉文的方式，企圖擠身豪門士家；然終因高門自成一圈的閥閱之別而未能盡意。

¹⁸ 汪征魯，《魏晉南北朝選官制度研究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95），68-69。

¹⁹ 陶希聖，〈南朝士族社會地位與政治權力（上）劉宋〉，《食貨月刊》4：8（台北，1974），5。

²⁰ 陳寅恪，〈述東晉王導之功業〉《金銘館叢稿初編》（北京：生活、讀書、新知三聯書店，2001），69。

²¹ 方北辰，《魏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》，（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1），88。

二、文學集團

(一) 南齊時期的「竟陵八友」

南齊時以蕭子良為中心西邸文學集團「竟陵八友」，正式形成時間應是在齊武帝永明5年，蕭衍、謝朓、王融、蕭琛、范雲、任昉、陸倕在西邸揪籠山（南京城東北），成為文人薈集之文化中心。²²竟陵八友皆才華出眾，為當時所著名的文士。竟陵八友文學集團的成立，除了彼此之間相識時間久、才華誠然冠冕於當時以外，也有文人彼此交遊攀附以獲取名聲的社會因素。南齊永明年間，至少有四個文人集團活躍於當時，王儉集團、蕭子良的永明集團、蕭嶷集團、蕭子隆集團，²³為文人才士雲集之中心。其中又以琅琊王氏王儉為最核心的集團；蕭道成代齊，王儉有「佐命之功」，王儉博學強記，喜用典，影響至蕭子良為首的文學集團。這些文學集團多以門第互稱，彼此交遊攀附。

竟陵八友從事禮佛活動亦多，其中永明十年（492）竟陵王蕭子良請求沙門僧祐去三吳講經，僧祐與蕭衍等人相識，文人也多以事佛為好，劉勰既然在永明8年即「入定林寺，依沙門僧祐」，劉勰應是有機會藉由僧祐與竟陵文人結識的。齊武帝建武五年（498），上定林寺釋法獻卒亡，法獻

²² 劉躍進，《門閥世族與永明文學》（北京：生活、讀書、新知三聯書店，1996），28-29。據劉躍進的說法，竟陵八友最遲至永明五年已然形成。時年沈約47歲、范雲37歲、任昉28歲、謝朓及蕭衍24歲、王融21歲、蕭琛20歲左右、陸倕18歲。

²³ 閻采平，〈士庶關係與齊梁文學集團〉，《文學遺產》3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，1994），27-28。

的弟子釋僧祐為之造碑墓側，時為丹陽尹的沈約為釋法獻製文。²⁴建武5年劉勰已入定林寺八載，若僧祐為其師造碑、沈約製文，劉勰亦應該有機會與沈約結識，為何遲至梁初《文心雕龍》已成，劉勰尚得裝作「貨鬻者」擋在沈約車前，才能將《文心雕龍》「干書」沈約？沈約喜與文士交往，譬如儒學冠於當時的劉瓛，沈約虛心拜謁；劉瓛養子劉顯也以儒學聞名於世，時為太子少傅的沈約引薦劉顯為「五官掾」。²⁵而東莞劉勰卻得需要花費一番功夫才能見著沈約，待遇的差別相當程度上顯示了當時門閥之區隔。

(二) 蕭梁時期的文學集團²⁶

蕭梁時期，文風鼎盛。《南史·文學傳》：

自中原沸騰，五馬南渡。綴文之士，無乏於時。降及梁朝。其流彌盛，蓋由時主儒雅，篤好文章，故才秀之士，煥乎俱集。²⁷

²⁴ （梁）慧皎等撰，《高僧傳合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）。（梁）慧皎，《高僧傳》卷13〈興福第八齊釋法獻11、齊釋法獻12〉，89-90。

²⁵ 姚思廉，《梁書》卷40〈劉顯傳〉，329。

²⁶ 蕭梁時代文學集團可大致粗分為三：以裴子野、劉之遴為首，依附在梁武帝蕭衍的周圍，主要貢獻在考古、校讎，如裴子野撰《宋略》、劉之遴校《漢書》、劉靈識刪減《尚書》；另為在晉安王蕭綱身旁的徐陵、徐擒、梁肩吾等，編纂宮體詩《玉台新詠》；另外是昭明太子的東宮文士，如劉孝綽、陸倕、王筠、到洽等，而劉勰《文心雕龍》顯現的「折衷」、「通變」思想，與昭明太子文學主張大抵相通。見周勛初，〈梁代文論三派述要〉，《魏晉南北朝文學論叢》（南京，江蘇省新華書店，1999），230-253。本文即探討以昭明太子為首的東宮集團。

²⁷ 李延壽，《南史》卷72〈文學傳〉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百納本二十四史，1988），737。

1. 《昭明文選》與《文心雕龍》

以昭明太子為首的東宮文學集團，編纂《昭明文選》，文選選入先秦到梁代（約前 450-526）近一千年、一百三十位作家、六百七十六個篇題的作品。《昭明文選》雖多有收入自秦迄梁的文學評論著作，如曹丕的《典論論文》、摯虞的《文章流別論》、沈約的《宋書·謝靈運傳》……。劉勰的《文心雕龍》與鍾嶸的《詩品》中所評論的著作，《昭明文選》大都收入；²⁸然而《昭明文選》卻也並非與《文心雕龍》如此相契合，《昭明文選》與《文心雕龍》只在選錄與評論的作家、作品上頗多重疊，卻不必然意味著《文心雕龍》受昭明太子等人重視。²⁹歷屆學者研究《文心雕龍》與《昭明文選》多以《梁書·劉勰傳》「昭明太子深愛接之」出發，說明劉勰的《文心雕龍》與《昭明文選》關係頗密切，且《文心雕龍》將文體分做 33 類（若加《文心雕龍·辨騷篇》「騷體」類，則為 34 類），與《昭明文選》分文章為 37 類，分類之項目大抵類似。³⁰然而這並不代表《昭明文選》的編纂深受劉勰的影響。《文心雕龍》多次批評摯虞的文章，《昭明文選》延用摯虞《文章流別集》的文章體類名稱；劉勰褒揚四言詩貶低五言詩，《昭明文選》推崇五言詩。劉勰注重文學政治教化的社會功能，《昭明文選》介紹多種文體；《文心雕龍》所評論的文章年代多久遠，評論古文詳細而時文省略，《昭明文選》選文則以與年代時間相隔較為接近

²⁸ 居守元，《文選導讀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96），12。

²⁹ 陳學舉，〈《文選》與《文心雕龍》對史部文章評錄標準之差異〉，《文藝學研究》118（南京：河海大學人文學院，1998.12），40-43。

³⁰ 穆克宏，〈《文選》與《文心雕龍》的關係〉，《臨沂師專學報》18：2（福建，1996.04），44-46。

的文章為主。³¹《昭明文選》與《文心雕龍》實際上差異之處甚多，關係並非相當密切。

昭明太子喜好文士，當時的才學之士，都集中在昭明太子的東宮附近。昭明太子蕭統曾撰古今典誥文《正序》10 卷、五言詩《文苑英華集》20 卷，唐代時均亡佚；³²另外尚有《文章英華》20 卷、《昭明文選》30 卷。昭明太子其間所編著的書籍有一百卷以上。才學之士幫助昭明太子編纂群書，其中最著名的是「昭明十學士」³³。「昭明十學士」中，琅琊王錫、王規、王筠、范陽張纘、張緬、吳郡陸倕、吳郡張率、陳郡謝舉、彭城劉孝綽、彭城到洽，皆為高門大族。「昭明十學士」的設立，應為天監 11 年（512），蕭統時年 12 歲；而昭明十學士的年歲由 43 歲（陸倕）到 14 歲（張纘和王錫）不等。天監 11 年，劉勰 46 歲，劉勰於前一年已為仁威南康王蕭績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，昭明書台在「蔣山定林寺後山北高峰上」³⁴與蕭績任職於南徐州（京口）相距甚遠。劉勰當時雖兼任東宮通事舍人，似乎並未受昭明太子重用，而是跟隨蕭績於南徐州。《昭明文選》編纂的

³¹ 趙福海，〈《文心·時序》篇與《文選》時義觀比較研究〉收入於《文心雕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2000），609-626。且《文心雕龍》要求作家改變「近附而遠疏」的風氣，《昭明文選》所收數宋齊作品相當多，二者之比較，亦可見王運熙、楊明，《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》，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），280-281。多所論列。

³² 居守元，《文選導讀》，21。

³³ 蕭子顯，《南史》卷 23〈王彧傳〉，272。「（王）錫，字公嘏……遷太子洗馬，時昭明太子尚幼。初，武帝敕錫與秘書郎張纘使入宮，不限日數，與太子游狎，情兼師友。又敕陸倕、張率、謝舉、王規、王筠、劉孝綽、到洽、張緬為學士，十人盡一時之選。」可尋得「昭明十學士」之名。

³⁴（宋 新安）張敦頤 編，（明 新安）吳琬校，《六朝事蹟編類》卷上〈梁昭明書台〉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6），98。

時間雖然學者說法不一，³⁵編纂的年代大致在劉勰卒亡（522）之後，《昭明文選》當無劉勰出力之痕跡。然而劉勰自天監 10 年兼任東宮通事舍人之後，卻也沒有任何在昭明太子旗下幫助編纂書籍或是與文士交遊的記載。天監 15 年，劉勰仍為蕭績之記室，撰《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》；天監 17 年，劉勰薦請二郊與七廟同用蔬果，於是升任步兵校尉，並依舊兼掌東宮通事舍人。天監 18 年，劉勰再次入定林寺與沙門慧震編纂群經。劉勰實際上待在昭明太子身邊的時間大致不出天監 16 年至 18 年，短短的 2 年時間，又無編纂參與的紀錄，昭明太子何來地「深愛接之」？

2. 士族與文化集團

蕭梁時代文風鼎盛，蕭梁皇室皆廣交文人，以提高自己的聲望地位。《梁書·文學傳序》：

高祖聰明文思，光宅區宇，旁求儒雅，詔採異人，文章之盛，煥乎俱集，每所御幸，輒命群臣賦詩，其文善者，賜以金帛，詣闕庭而獻頌者，或引見焉。³⁶

梁武帝引進文學之士，吳興沈約、江淹、任昉、彭城到溉、吳興丘遲、東海王僧孺、吳郡張率；彭城劉孝綽、劉孺、彭城到溉、到洽、吳郡陸倕，

³⁵ 居守元，《文選導讀》之推論，認為《昭明文選》的編纂在 526-531 年間。而另有說法認為是普通 3 年至 6 年（522-525）東宮文人才士最為繁盛的時候所編，見謝康等，《昭明太子和他的文選》（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1971），85。且也有《昭明文選》之編纂為大通元年至大通二年（527-528）的說法，見清水凱夫著，周文海譯，〈《文選》的編纂實況研究〉，《鄭州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4（鄭州，1994）。而無論何時開始編纂《昭明文選》劉勰於天監二年（521）年已出家，翌年遂卒。

³⁶ 姚思廉，《梁書》卷 49〈文學傳上〉，395。

梁武帝對待他們「雖仕進有前後，其賞賜不殊。」³⁷。如劉孝綽在宴會上作詩七首「高祖覽其文，篇篇嗟賞，由此朝野改觀焉。尋有敕，知青、北徐、南徐三州事」³⁸，後來官至秘書丞；劉孝綽還曾以一詩之功被拔擢，梁武帝曾做《籍田詩》「高祖以孝綽尤工，即日有敕，起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」³⁹雖然後來劉孝綽婉拒之，但這件事情還是代表梁武帝當場想升任劉孝綽的意圖。中大通 5 年，梁武帝宴群臣樂游苑，命令褚翔與王訓做二十韻詩，「即日轉宣成王文學，俄遷為友」⁴⁰。由宣成王「文學」升為宣成王「友」，算是相當特殊之待遇。

而屬於一般士族的庾於陵於天監年間拜太子洗馬：

舊事，東宮官署，通為清選，洗馬掌文翰，尤其清者。近世用人，皆取甲族有才望，時於陵與周舍並擢充職，高祖曰：『官以人而清，豈限以甲族？』時論以為美。⁴¹

庾於陵是〈哀江南賦〉的作者庾信的伯父，陳寅恪先生考證庾氏一族本來「負洛而居」，永嘉之亂，中原乏主，所以遷至南揚新野縣，隨即遷南郡江陵縣，庾氏雖為僑姓高門，政治地位卻遠次於江東洛陽如王導等大族。⁴²同樣南遷定居，東莞劉氏與庾於陵皆屬一般士族，但軍功之家的劉氏與庾於陵的文質士族，仍然有所差異。根據方北辰先生的研究，南方高門僑姓軍權喪失，逐漸失去軍事影響力，高門大族為維持社會地位，多以

³⁷ 姚思廉，《梁書》卷 49〈劉苞傳〉，397。

³⁸ 姚思廉，《梁書》卷 33〈劉孝綽傳〉，276。

³⁹ 姚思廉，《梁書》卷 33〈劉孝綽傳〉，277。

⁴⁰ 姚思廉，《梁書》卷 41〈褚翔傳〉，399。

⁴¹ 姚思廉，《梁書》卷 49〈庾於陵傳〉，397。

⁴² 陳寅恪，《魏晉南北朝史演講錄》（合肥：黃山書社，2000），124。

文采見著。同時梁武帝好文，多授以世家大族文職高官，士族也樂以文雅著稱，因此蕭梁政權依舊以高門任職清官。⁴³前述之彭城劉孝綽、河南褚翔、琅琊王訓、汝南周舍皆為世家大姓；庾於陵亦屬於高門大族。士庶區隔嚴格化的結果，使得高門大族憑藉血統以及婚姻關係作為地位區隔；政治上高門清望官容易取得，遂多以文風清談為尚，並鄙薄武事，齊梁之際尤然。⁴⁴世家大族或以清談玄理，或以經學注述，文集之編纂亦多。

梁朝皇室貴族多從事總集的編纂。安成王蕭秀好賢下士，招徠劉峻編纂《類苑》120卷；⁴⁵天監7年（508）由劉杳主持編纂《壽光書苑》200卷，天監15年梁武帝蕭衍命徐勉學士入華林園撰《華林遍略》，徐勉、何思澄、顧協、劉杳、王子雲、鍾嶼等六人，以及華林園學士百餘人參與編纂《華林遍略》700卷。⁴⁶蕭衍尚命令編纂《通史》600卷，⁴⁷蕭子顯、吳均參與。⁴⁸周舍負責《歷代賦》10卷編纂。⁴⁹武帝自撰《連珠》1卷⁵⁰以及《制旨連珠》10卷⁵¹，要求何佟之、賀瑒、嚴植之、明山賓等文士，撰吉凶軍賓嘉五禮1000餘卷⁵²。簡文帝蕭綱也有「高崑學士」的組成，蕭綱

⁴³ 方北辰，《魏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》，90。

⁴⁴ 唐長孺，《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》，（武昌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1992），162。

⁴⁵ 姚思廉，《梁書》卷22〈安成康王秀傳〉，198。

⁴⁶ 李延壽，《南史》卷72〈何思澄傳〉，745-746。

⁴⁷ 姚思廉，《梁書》卷3〈武帝紀下〉，60。

⁴⁸ 姚思廉，《梁書》卷35〈蕭子恪傳〉，295。以及同書卷49〈吳均傳〉，403。

⁴⁹ 姚思廉，《梁書》卷49〈周興嗣傳〉，403。

⁵⁰ 姚思廉，《梁書·丘遲》：「時高祖著《連珠》，詔群臣繼作者十餘人，（丘）遲文最美。」

⁵¹ 魏徵，《隋書》卷35〈經籍志〉，1087。

⁵² 姚思廉，《梁書》卷3〈武帝紀下〉，60。

在晉安王時代命庾肩吾、劉孝威等抄撰叢集。⁵³蕭綱在雍州組織了陸罩、蕭子顯等三十人，於中大通6年編成《法寶連璧》。⁵⁴蕭梁皇室擢用文人編纂群書是為一普遍現象。而文人集團多為琅琊王氏、陳郡謝氏、彭城劉氏、吳郡陸氏、汝南周氏、徐陵、庾信父子、柳惲、何遜兄弟。文學世家成為一種社會現象。⁵⁵高門掌握文化上的優勢。而劉勰以軍功世家出身，企圖以武轉文，但高門大族因為軍事地位漸受侵蝕，只得更為講究門閥之別，以求社會地位之保持。因此在文化上，在在顯示的是顯赫士族的文學集團。這也許是劉勰被擯於當時文學集團之外的主因。

三、梁武帝蕭衍與士人

梁武帝天監四年（505）詔曰：

今九流常選，年未三十，不通一經，不能解褐。若有才同干、顏，勿限年資。⁵⁶

天監八年：

其有能通一經，始末無倦者，策實之後，選可量加敘錄，雖付牛監羊肆，寒品後門，並隨才試吏，勿有遺隔。⁵⁷

⁵³ 姚思廉，《梁書》卷49〈庾於陵傳〉，398。

⁵⁴ 姚思廉，《梁書》卷4〈簡文帝紀〉，66。記載蕭綱旗下文人嘗編《昭明太子傳》5卷、《諸王傳》30卷、《禮大義》20卷、《老子義》20卷、《莊子義》20卷、《長春義記》100卷、《法寶連璧》300卷，行於當世。

⁵⁵ 閻采平，〈士庶關係與齊梁文學集團〉，22-28。

⁵⁶ 姚思廉，《梁書》卷2〈武帝紀中〉，32。

梁武帝重視儒學經典，命明儒何恪之、賀瑒、明山賓、沈峻、嚴植之等五經博士各主一館，館有生員數百；射策通經者升任為吏。梁武帝時官學頗振，天監初年設置國子學以及五館學、州郡學；分遣博士祭酒，巡視州郡立學。⁵⁸

一般寒門子弟可以由入學和試吏進入仕途。南朝任官尚有「寒人掌機要」的現象。世家大族多以清望甚高的文官為主，政治上實際的作用並不大。因此實際政治權力往往為「權幸」所掌握，如《南史》、《宋書》、《南齊書》的〈恩幸傳〉、〈幸臣傳〉中所載之人。南朝中書通事舍人歷經齊、梁、陳三朝為掌握機要之職。梁、陳之際，掌握「機要」者以寒門乃至小姓為多，梁武帝時期，專任或是兼任中書通事舍人的官職 36 人中，多為門第較低的士族，如錢塘朱異、會稽孔修源、庾於陵、東海徐勉。⁵⁹而這些人中，若是通經者更佳。精通經學的孔修源因為能夠解釋朝儀，為梁武帝所賞識；⁶⁰錢塘朱異因為通《禮》、《易》，受明山賓的推薦而入仕。⁶¹

梁武帝時期任用一般世族乃至寒門負責重要政事，高門士族官高而虛名，無甚實權。《顏氏家訓·勉學·涉務》：「其餘文藝之士，多迂誕浮華，不涉事務，纖微過失，又惜行捶楚，所以處於清高，蓋護其短也」⁶²。梁武帝時，任用的中書舍人 36 人當中，大部分是門第較低的士族，且多為

⁵⁷ 姚思廉，《梁書》卷 2〈武帝紀中〉，36。

⁵⁸ 汪征魯，《魏晉南北朝選官制度研究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95），261。

⁵⁹ 方北辰，《魏晉南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》，90。

⁶⁰ 姚思廉，《梁書》卷 36〈孔修源傳〉，299。

⁶¹ 蕭子顯，《南史》卷 62〈朱異傳〉，634。

⁶² 顏之推著，易孟醇、夏光弘註譯，《顏氏家訓》（長沙：岳麓書社，1999），156。

擅長經術與文學的才士。⁶³然而任用文人，梁武帝也酌情做官品上的升降，有才幹者受拔擢，如徐勉。而一般文人多以清望官任之。天監年間，曾與蕭衍同窗的「竟陵八友」之一的陸倕，曾任太子中舍人、太子庶子、太子中庶子，陸倕的文章《新刻漏銘》、《石闕銘》二文為《昭明文選》所錄；眾多文集的編纂以及文學集團的活動也多有陸倕參與，然而陸倕之官職始終不高，也許是因為陸倕甚無辦事之才幹。⁶⁴而梁武帝卻也是對陸倕的評價甚高的。⁶⁵魏晉南朝雖以門第見重，但卻也不乏寒門入仕，然而一般士族乃至寒人受重視，多以政治上的能力為考量。寒門受擢用，也是著眼於與勢家大族相抗衡之用處。劉勰長於文采，然而似乎並無政治上的能力，對於梁武帝來說沒有重用的必要。劉勰入居定林寺十餘年「奉時而聘績」，梁武帝卻著眼的是劉勰的佛學能力——編纂佛經與撰寫碑文。

四、劉勰與佛學之淵源

（一）編纂群書與撰寫碑文

梁武帝自天監 6 年至 18 年（507-519）敕令僧侶學者從事佛教經論群書編纂。於中山上定林寺以及宮城旁的華林園進行。釋僧旻負責《眾經要抄》，釋寶唱編纂各類佛教儀典，如「建福」、「禮懺」、「祭祀」等類

⁶³ 方北辰，《魏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》，91。

⁶⁴ 曹道衡，〈梁武帝與竟陵八友〉，《齊魯學刊》5（曲阜：曲阜師範大學，1999），52。

⁶⁵ 陸倕去世後，蕭統曾勉勵昭明太子蕭統與蕭綱以陸倕之賢：「陸（倕）生資忠厚貞，冰清玉潔，文該四始，學遍九流，高情勝氣，貞然直上。」見姚思廉，《梁書》卷 27〈到洽傳〉，232。

之典籍。⁶⁶與劉勰最有關係的當屬釋僧祐。僧祐為齊梁之際有名高僧，梁武帝深加禮遇。天監9年(510)審查偽經、天監16年(517)「宗廟去犧牲」的重大事務，釋僧祐均參與其事；僧祐並整理佛典、編輯經藏。⁶⁷

劉勰24歲因「家貧，不能婚娶」遂入定林寺，跟隨僧祐，並替高僧撰寫碑文；《高僧傳》所錄高僧傳記之文章，計有3篇高僧之碑文是由「東莞劉勰」製文，如釋超辯於永明10年(492)歿於上定林寺，沙門僧祐為之造碑墓所，「東莞劉勰製文」。⁶⁸據牟世金先生考定，劉勰24歲入定林寺，26歲撰釋超辯、釋僧秀的碑文。37歲雖起家奉朝請，仍在上定林寺編纂群書。天監7年(508)雖任地方官太末令(太末為今浙江衢縣)，隨即於參與《眾經要抄》的編纂；天監7年11月開始至8年4月，梁武帝讓釋僧旻主持，釋僧智、釋僧晃以及時為中軍將軍臨川王蕭宏記室的劉勰等30人，同入上定林寺抄經論，編纂《眾經要抄》80卷。⁶⁹天監17年(518)為仁威將軍南康王蕭績記室的劉勰，兼任東宮通事舍人；又被命令撰寫《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》碑文，因為建安王蕭偉久病纏身，希望藉由造碑祈福，以解久痾；劉勰應時聽從命令而撰碑文。替高僧做傳、編纂《眾

⁶⁶ 顏尚文，《梁武帝》(台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99)，131-135。

⁶⁷ 僧祐多次受敕編輯群書，如《出三藏記集》10卷、《法苑集》10卷、《世界記》5卷、《釋迦譜》5卷、《薩婆多部相承傳》5卷、《弘明集》10卷、《十誦義記》10卷、《法集雜記傳銘》7卷。見釋僧祐，《出三藏記集》卷12〈釋僧祐法集總目錄序第三〉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5)，457-459。

⁶⁸ (梁)慧皎等撰，《高僧傳合集》。(梁)慧皎，《高僧傳》，關於釋超辯見卷12，〈誦經第7·釋超辯17〉，86。關於釋僧秀見卷8〈義解5·釋僧秀12〉，58。關於釋僧祐見卷11〈明律5·釋僧祐13〉，81。

⁶⁹ (梁)慧皎等撰，《高僧傳合集》。(唐)道宣，《續高僧傳》，卷5〈義解篇初·梁揚都莊嚴寺沙門釋僧旻傳8〉，143。以及卷1〈譯經篇初·梁揚都莊嚴寺釋寶唱傳2〉，106。

經要抄》、撰寫碑文，劉勰徒富滿腔文采，《文心雕龍》既然體大慮周，為何劉勰在蕭梁一代受到皇室所用的，僅只為「為文長於佛理」之才能？

(二) 《滅惑論》與《神滅論》

現存劉勰之文章，除了廣為人知的《文心雕龍》以外，尚有《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》以及《滅惑論》。《滅惑論》收入於僧祐所編的《弘明集》，牟世金先生認為《滅惑論》應成於《文心雕龍》之前，約莫建武4年(497)；據王元化先生考察，《滅惑論》應為梁天監3至7年(504-508)所做，為反駁崇道反佛的《三破論》之時論，因為《滅惑論》主張玄、佛並用，《文心雕龍》以「宗經」之儒家思想為主，王更生先生認為劉勰此篇文章用於迎合上意的可能性很大。⁷⁰梁武帝時代佛教政策多敕令法雲、僧旻等沙門入宮研商擬定。⁷¹天監6年(507)范縝發表「神滅論」引起梁武帝朝野大嘩，梁武帝於是敕令法雲領頭破論，並主導王侯朝貴64人圍剿范縝「神滅論」。64人中有尚書令沈約、吏部尚書徐勉、散騎常侍蕭琛、豫章王主傅王筠、五經博士明山賓、太子中舍劉洽等。⁷²劉勰天監6年先是在車騎將軍夏侯詳下任倉曹參軍，6月則擔任地方官太末令。朝野盛囂塵上的崇佛、反佛大論戰，無論劉勰的《滅惑論》成於何時，劉勰與這些辯論，似乎幾無見諸史籍的地位。

⁷⁰ 王元化，〈《滅惑論》與劉勰的前後期思想變化〉，收錄於《文心雕龍講疏》，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)27-49。

⁷¹ 顏尚文，《梁武帝》，117。

⁷² 慧皎，《弘明集》卷10〈大梁皇帝敕達臣下神滅論〉，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)，61-69。

以年代為基準比較當時編纂群書之士以及劉勰的仕途經過。齊永明五年（487）「竟陵八友」成立，劉勰年21歲為守喪期間；永明八友皆為高門之士。梁天監7年（508）劉杳奉敕編纂《壽光書苑》，劉勰時為太末令，而後擔任中軍將軍臨川王蕭宏記室，隨即入定林寺參與《眾經要抄》的編纂。天監11年（512）「昭明十學士」成立，劉勰為仁威將軍記室，跟隨蕭績於南徐州。天監15年（516）徐勉、何思澄等文士編《華林遍略》，劉勰當年仍在定林寺撰〈梁建安王造剎山石城寺石像碑〉碑文。近人姚名達先生《目錄學》概觀南北朝佛錄「及南北分立之世，譯經日多，藏經日富，目錄者接踵而出……釋僧祐之出三藏記集首作小傳及書序為目錄之附錄。而籍經結藏，亦始於僧祐、劉勰之於定林山寺，僧紹、寶唱之於華林殿，一再撰目，遂成為世業。」⁷³劉勰以鐘山定林寺四千卷佛經為基礎，編制定林寺經藏目錄，誠為《梁書》所載的「今定林寺經藏，勰所定也」。然而徒負文采的劉勰仕宦之途既不順利，編纂群書的文士集團亦無甚劉勰參與的痕跡，劉勰的才能是只用在佛學上了。這也許也是「好事佛」的梁武帝看中劉勰之處吧！

餘論

東晉南朝時期高門的整體傾向是偃武就文。士族以經學、文學等文化素養彼此相尚；依據毛漢光先生《中國中古社會史論》分析，士家大族南下，因為脫離原郡之社會基礎，而有向中央政權靠攏依附的中央化傾向，或以文才作為致仕之途。⁷⁴東莞劉氏從北府軍團興起，劉宋一代是為顯赫

⁷³ 姚名達，《目錄學》〈宗教目錄篇·南北朝佛錄概觀〉，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2002），247。

⁷⁴ 毛漢光，《中國中古社會史論》，98。

的軍功家族，劉穆之、劉秀之的官位列三公，至劉勰之父劉尚任越騎校尉，家道已然中落，傳至劉勰早已無軍事之背景，東莞劉氏也就由武質士族轉向文質士族。劉勰二十多歲入上定林寺，閱覽群書；《文心雕龍》是為劉勰文學能力的證明；然而南朝門閥森嚴，空有才能的劉勰，雖歷任清望之官，終因家門之隔而未受重用，文學集團仍為士家大族所掌握，劉勰並無明顯參與之跡象；而劉勰個人甚為重視的文學才能，也並非梁朝皇室看中劉勰的部分。劉勰雖空有「體大思精」如《文心雕龍》的滿腹才華，卻也只能受詔入寺編纂佛經。劉勰最後落得自請出家的結果。

東晉南朝高門逐漸退出軍事舞台，士家大族鄙薄武事，寧可子弟喜尚文風。⁷⁵東莞劉氏在劉宋時期因軍功起家，因繼起之蕭齊軍團的不同，家道逐漸中落；蕭梁時代，劉勰個人企圖從軍功之家轉向文質士家，以求融入當時高門大族，是為沒落士族企圖找回社會地位乃至政治權力的一個例證。同時掌機要的寒人寧可透過聯姻或是文風交流，向士族靠攏。因此南朝時期，高門大族雖然軍事權力、實質政治權力逐漸被寒人及一般士族架空，但因為社會地位聲望的依舊高張，文化上仍持有優勢，反使得高門世家以外的階層靠攏依附，以取得社會上的地位聲望；社會上這樣的普遍現象，卻也是當時寒人雖掌握某種政治權力，卻並未造成社會階層陵替的原因。

劉勰的時代也反映東晉士家大族逐漸腐敗以及寒人興起的現象。實際政權由「掌機要」的寒人及一般士族控制，高門大族只剩下社會地位，高門大族於是更講求門閥之別，以清談玄理的形式自成一龐大集團；使得士庶之別在南朝尤為嚴重。過於強調門第聲望，卻只代表士家大族無力於政治實權受侵蝕下的無奈與反彈。高門或以經學家傳、或以文風相尚、或崇

⁷⁵ 毛漢光，《中國中古社會史論》，89。

佛好玄，文人才士彼此之間的交流，交流之文化圈成爲地位象徵，都僅是使得他們自己淪於文化之裝飾品。

縱觀劉勰一生仕宦之途，奉朝請雖多爲士家大族之起家官，劉勰起家奉朝請也許是因爲沈約的推薦、也許是劉勰自己的門風遺緒，然而奉朝請只是一種虛職。而後劉勰擔任中軍將軍記室、仁威將軍記室，皆爲武官之僚屬，官品、地位象徵皆不高，而後擔任太末地方之縣令、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，在官品上既不受重視；文學類叢書的編纂也未見其名。梁武帝好佛，大興佛塔、營造佛寺、辦經筵講座，劉勰居於上定林寺十多年，佛經的才能卻只成爲梁武帝看中劉勰的地方，這也許是「奉時以聘績」的劉勰始料未及的。

謝明達，《晉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。
毛漢光，《中國中古史學之發展》，2002，247。
毛漢光，《中國中古史學之發展》，2002，247。

參考書目

書目

牟世金，《劉勰年譜匯考》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88。

周貞亮，《梁昭明太子蕭統年譜》，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1。

姚思廉，《梁書》，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8，百納本二十四史。

蕭子顯，《南齊書》，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8，百納本二十四史。

沈約，《宋書》，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8，百納本二十四史。

李延壽，《南史》，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8，百納本二十四史。

閻步克，《品位與職位——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2。

居守元，《文選導讀》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96。

劉勰，《文心雕龍輯注》，台北：台灣中華書局，1986，四部備要集部本。

（梁）僧祐，《弘明集》（唐）道宣，《廣弘明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。

顏之推 著，易孟醇、夏光弘 譯注，《顏氏家訓》，長沙：岳麓書社，1999。

劉躍進，《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》，北京：生活、圖書、新知三聯書店，1996。

謝康 等，《昭明太子和他的文選》，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1971。

張敦頤，《六朝事蹟編類》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25。

朱銘盤，《南朝梁會要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。

- 汪征魯，《魏晉南北朝選官體制研究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95。
- 唐長孺，《魏晉南北朝史論叢》，河北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0。
- 唐長孺，《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》，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6。
- 毛漢光，《中國中古社會史論》，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97。
- 王伊同，《五朝門第》（上）（下），沙田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78。
- 顏尚文，《梁武帝》，台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99。
- 陳寅恪，《金銘館叢稿初編》，北京：生活、讀書、新知三聯書店，2001。
- 王更生，《文心雕龍研究》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79。
- 王元化，《文心雕龍講述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。
- 趙福海，〈《文心·時序》篇與《文選》時義觀比較研究〉，收入於《文心雕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2000。
- （梁）慧皎等撰，《高僧傳合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。
- 周勛初，〈梁代文論三派述要〉，收入於《魏晉南北朝文學論叢》，南京：新華書店，1999。
- 陳寅恪，〈南朝官制的變遷與社會階級轉變的關係〉，收入於萬繩楠主編，《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演講錄》，台北：雲龍出版社，1995。
- 方北辰，《魏晉南朝江東勢家大族述論》，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1。
- 周一良，〈論梁武帝及其年代〉《魏晉南北朝史論集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7。
- 周一良，〈《南齊書·丘靈鞠傳》試析間論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濁〉《魏晉南北朝史論集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7。

- 周一良，〈南朝境內支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〉《魏晉南北朝史論集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7。
- 田餘慶，〈論東晉門閥政治〉《秦漢魏晉史探微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3。
- 程光裕、徐聖謨主編，《中國歷史地圖》，台北：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，1984。
- 姚明達，《目錄學》，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2002。
- 中日韓文論文
- 陶希聖，〈南朝士族之社會地位與政治權力(上)劉宋〉，《食貨月刊》4：8(台北，1974)。
- 閻采平，〈士庶關係與齊梁文學集團〉，《文學遺產》3(中國社會科學文學院，1994)。
- 清水凱夫著，周文海譯，〈《文選》的編纂實況研究〉，《鄭州大學學報(哲學社會科學版)》(1994)。
- 陳學舉，〈《文選》與《文心雕龍》對史部文章評錄標準之差異〉，《文藝學研究》118(南京，1998)。
- 穆克宏，〈《文選》與《文心雕龍》的關係〉，《臨沂師專學報》18：2(福建，1996)。
- 易健賢，〈劉勰三夢和他的「奉時以聘續」心態——關於《文心雕龍》成書的思考〉，《貴州教育學院院報(社會科學版)》1(貴州，1996)。